

霸权的印象管理*

——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蒲晓宇

【内容提要】 霸权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能否维持其霸权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对美国霸权的研究有不同的理论角度。围绕一个霸权国在国际秩序变动中如何管理其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印象这一问题,作者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分析美国作为霸权国的行为模式。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试图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亚太再平衡面临不同观众的期待,这些观众主要包括中国、美国的亚太盟友和美国的国内观众。在信号传导过程中,针对一类目标观众的信号可能被另一类目标观众同时接受并做出不同的解读。同时,中美关系面临地位困境的挑战:一方试图维持其相对位置的行为,导致另一方做出对应反应,双方耗费不必要的资源展开竞争但并不改变原有的地位排序。美国对于维护既有霸权地位具有强烈的偏好,而一个不够自信的美国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风险。中美在亚太地区如何包容彼此的角色,需要两国持续探索。

【关键词】 霸权;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亚太再平衡战略

【作者简介】 蒲晓宇,美国内华达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

【中图分类号】 D815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

(2014)09-0034-16

* 本文英文初稿曾于2014年3月在多伦多举办的“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上宣读,感谢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教授的点评。感谢理查德·贝茨(Richard K. Betts)教授、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教授、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教授就有关问题接受笔者的深度访谈。在中文稿修订过程中,杨原、尹继武、左希迎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供了批评与建议,董柞壮协助文字校订,在此一并致谢。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霸权的印象管理

霸权的兴衰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能否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一个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一般认为追求安全是大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动机。但是,狭义的安全动因很难解释美国当前的大战略。美国战略学者理查德·贝茨(Richard K. Betts)指出,“当美国变得更为安全的时候,却更强化其武力”。^① 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身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但美国并没有实施战略克制与战略收缩,反而推行了比冷战时代更具扩张性的大战略。^② 当前,美国的战略家们激烈地争论着如何评估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与角色。一些分析家认为,既然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有必要实施自我限制与战略收缩。^③ 然而,其他学者却并不认为美国的实力在衰落,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④

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管理其超级大国地位,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问题。换言之,未来美国大战略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做一个“节俭的超级大国”。^⑤ 借鉴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国际秩序变动过程中,一个霸权国如何管理其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印象? 国际政治中的霸权既有物质实力基础,也有社会心理基础,二者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比如,美国一方面要巩固自己的物质实力基础,另一方面又力图在国际体系中维持其霸权地位的印象。印象管理的视角主要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研究霸权的行为规律。就霸权护持来讲,印象管理具体通过地位信号释放来实现。在国际关系领域,地位信号释放指的是政府或领导

① Richard K. Betts, *American Force: Dangers, Delusions, and Dilemmas i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

② 有些学者对美国采取的扩张战略持强烈批评。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最多维持其区域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要有所克制。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Imperial by Design,” *National Interests*, No. 111, 2011, pp. 16-34。对美国霸权战略的反思与批判,还可参见 Barry R. Posen,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 S. Grand Strate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Simon Reich and Richard Ned Lebow, *Good-Bye Hegemony: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 7; Barry R. Posen,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 S. Grand Strategy*, 2014。

④ 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3, 2012/2013, pp. 7-51。

⑤ Michael Mandelbaum, *The Frugal Superpower: America’s Global Leadership in a Cash-Strapped Era*,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人运用一些行为或言辞,传递一个国家希望获得或已经获得的特定国际地位的若干信息。换言之,地位信号释放旨在改变或者维持国内观众和国际观众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地位所持有的看法。^① 地位信号不同于国际政治领域的其他信号传导模式;地位信号传导的目的不是传导一种良性意图或可信的威慑。地位信号挑战了国际政治中象征模式和理性模式的两分法,体现了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路径具有对话和合作的空间。^②

本文首先回顾对美国霸权研究的不同视角,然后提出国际政治领域有关印象管理和地位信号的分析框架,最后运用美国重返亚太作为案例来说明相关的理论机制。

二 有关美国霸权的学理争论

美国霸权是否衰落是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霸权”在中文叙述中通常是指用实力控制别国的行为模式。霸权常常跟“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具有一定贬义。而国际关系的英文文献中,霸权(hegemony)是一个相对中立的概念,指一个国家所处的超群的优势地位或能力。^③ 本文讨论霸权的印象管理,主要将霸权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来使用。

概括起来,现有文献对美国霸权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如何判断美国霸权的实力基础是一个焦点。霸权的实力变化是国际秩序变动的重要动因,因此,物质实力是研究美国霸权的逻辑起点。当前美国大战略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是否要实施战略收缩,而讨论战略收缩的前提是讨论美国的物质实力是否相对衰落。^④ 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我们关注美国的印象管理,讨论其物质实力仍然是必要的。二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学界先后出现过几波美国衰落论,比如,苏联军事

① 对地位信号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讨论,参见 Xiaoyu Pu, “Limited Rebranding: Status Signaling, Multiple Audiences, and the Incoherence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Ph. D. Dissertatio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2012, chapter 2; Xiaoyu Pu and Randall Schweller, “Status Signaling, Multiple Audiences, and China’s Blue-Water Naval Ambition,”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41–162.

② James Fearon and Alexander Wendt, “Rationalism V. Constructivism? A Skeptical View,”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52–72. 对象征现象做出理性选择的解释,参见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Michael Suk-Young Chwe, *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对“霸权”一词含义的不同解读,参见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8页。

④ 对美国战略收缩的讨论,参见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即将刊发)。

实力的崛起、日本经济崛起与海外商业扩张等曾经对美国构成冲击,推动了当时“美国衰落论”的兴起。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相对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以后,美国被两场反恐战争拖累,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实力。随着新兴国家的迅猛发展,美国未来能否继续保持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成为一个新的讨论焦点。^①单从经济指标来看,随着新兴国家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它们必将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也必然要求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在中短期内,美国的综合实力仍具有较为全面的优势,尤其在军事、科技、地缘政治、人口结构等方面的优势最为明显。^②与此同时,美国未来还面临不少挑战,仍可能长期受内部改革乏力、财政赤字严重等问题的困扰。美国能否维持优势地位,除了依赖其是否执行明智的对外战略,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能否成功推动内部改革。

其次,霸权的护持机制是研究美国霸权的另一个角度。在冷战时代,美国的海外军事干预行为最根本的动机是霸权护持,美国的目的是遏制可能对其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的一个或多个国家。^③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但美国并没有实施战略收缩,而是继续探寻巩固其霸权地位的模式。1999年,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文章,全面阐释了“单极稳定论”的观点。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具有独特性。不同于两极或多极引发大国制衡行为,由于冷战后美国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没有大国有意愿和能力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因此,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是持久稳定的。^④美国霸权除了物质实力的基础,更取决于美国在二战以后创建的各种国际机制。^⑤即使美国的硬实力相对衰落,美国也可以通过其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和联盟体系,继续维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⑥美国处于世界政治各种关联性议题的核心地位,这个优势也有利于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⑦在金融

① Robert A. Pape, "Empire Falls,"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99, 2009, pp. 21-34.

② 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国家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14-141页;Robert J. Lieber, *Power and Willpower in the American Future: Wh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Destined to Declin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Bruce Jones, *Still Ours to Lead: America, Rising Power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Rivalry and Restrai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4.

③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④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5-41.

⑤ 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1期,第74-88页。

⑥ G.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23-37.

⑦ Anne-Marie Slaughter, "America's Edge: Power in the Networked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pp. 94-113.

危机的背景下,美国继续通过国际金融贸易制度护持其霸权地位。^① 霸权护持离不开霸权的思想逻辑和意识形态。^② 除了有物质实力和制度做支撑,霸权往往还掌握着某些象征权力,通过控制这些象征、符号、观念等,霸权的主导地位得以长期维持。^③

最后,针对霸权的抗争行为与霸权的相对衰落,是研究美国霸权不可避免的角度。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平衡与海外过度扩张,主导性大国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④ 新现实主义学者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指出美国的霸权地位必然受到新兴大国的反抗和制衡。^⑤ 在单极体系下,即使其他国家不能采用军事制衡的方式对付美国霸权,这些国家可以采取“软制衡”或其他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来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⑥ 九一一事件之后,学术界兴起对美国霸权正当性的反思和批判。在国际政治中,霸权不仅意味着超强的实力,还意味着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依赖国际社会其他国家认可。美国过度滥用其超群的实力,则会带来一种国际正当性困境,即美国霸权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可能下降。^⑦ 同时,考虑到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长期趋势,一些美国学者主张美国必须调整自己的大战略,实施自我克制和战略收缩。^⑧

在国际秩序变动中,美国如何管理其在国内外观众心目中的印象,是研究美国霸权尚待开发的新角度。如果霸权国占据一种独有的国际地位,这种国际地位既有物质实力的层面,也有社会心理属性的层面。^⑨ 换言之,霸权需要有物质实力做基础,但其

① 李巍:《霸权护持:奥巴马政府的国际经济战略》,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51-66页。

②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载《美国研究》,2003年第3期,第7-29页;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信仰根源》,载《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第47-52页。

③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1, 2011, pp. 41-72; Steven Weber and Bruce Jentleson, *The End of Arrogance: America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Idea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rles A. Kupchan,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Hegemony and the Coming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 *Security Studies*, Vol. 23, No. 2, 2014, pp. 219-257.

④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Vancouver: Vantage, 1989.

⑤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5-41.

⑥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46-71;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pp. 41-72; 蒲晓宇:《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23-36页。

⑦ 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载《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第56页;刘丰:《美国霸权与全球治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困境》,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9-16页。

⑧ Barry R. Posen, *Restraint: A New Foundation for U. S. Grand Strategy*, 2014.

⑨ 对霸权的物质因素与观念因素常常缺乏一种综合的分析,对此的批评参见 Ted Hopf, "Common-Sense Constructivism and Hegemon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2, 2013, pp. 317-354.

维持还必须依赖国内外观众对霸权地位的认可。比如,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既有美国金融产业优势的因素,同时,也有某种国际威望和国际形象方面的优势做支撑,尤其美国在金融领域具有的所谓“帝国的光环”,对维护美国金融霸权具有重要意义。^①霸权的印象管理主要涉及霸权的社会心理因素,但与物质实力也有关联,是观察霸权行为规律的一个综合的视角。

三 国际政治中的印象管理与地位信号

本文借鉴社会科学中关于印象管理与地位信号的有关概念,对美国作为霸权国的行为模式做一些分析。

“印象管理”这个概念来源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作品。戈夫曼将社会生活中个人的印象管理类比为戏剧表演。^②正如戏剧大师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所说:“人生如舞台,人人都是演员。”戈夫曼把这个论点创造性地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探索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印象管理的规律,并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理论分支——拟剧论(dramaturgical theory)。根据这种理论,人的社会行为面对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尤其可以把人的印象管理行为分成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③在社会生活中,许多“面子工程”基本可以被看成前台行为,是有意演给局外观众看的;后台行为是某人更为真实的行为,只会在关系密切的人面前展示。印象管理取决于某人对自己在其社会关系网中所扮演角色和所处地位的看法。社会心理学家黄光国运用中国人的生活例子生动地说明了面子与印象管理的关联:“正如演员借助布景和道具来塑造其前台演出,许多中国人细致地安排同他人互动时的场景,刻意地设计他们的外表和举止,以此来展示那些标志财富、知识、地位以及审美等方面的权力符号。”^④

在《国际关系中的印象逻辑》这本著作中,国际政治理论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把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借鉴到国际政治领域,系统研究了国家战略互动过程中印象管理的问题。杰维斯指出,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及其领导人在印象管理过

① 李辉、唐世平、金洪:《帝国的光环:美国金融危机的历史制度解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29-154页。

② Erving Goffman,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③ Erving Goffman,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

④ H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2, No. 4, 1987, p. 961.

程中有强烈的动机从事战略欺诈。^① 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信号释放与信号接收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杰维斯强调这两个过程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比如,信号释放者要预判信号可能被接收的方式,同时,信号接收者解读信号时需要判断信号释放者的特征。^② 从研究的可操作的角度,他早期的研究把这两个过程分别加以处理。信号释放的理论体现在《国际关系中的印象逻辑》一书里,而信号接收的理论则体现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这本著作中。^③

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追求特定的国际地位,为此需要维持某种特定地位的印象。霸权国管理自己的印象,主要是管理其独有的国际地位。在国内社会中,地位是指一个人相对于他人的社会或职业等级。有关地位的理论 with 实证研究分散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对炫耀性消费的研究是研究社会地位的重要理论视角。^④ 在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看来,“有闲阶级”往往通过对奢侈品的消费来炫耀他们的社会地位。^⑤ 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提出了与此相关的“位置性商品(positional good)”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限量供应的商品中,因为本身的稀缺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相对位置的满足感。^⑥

本文把其他学科关于地位信号传导的概念借鉴到国际政治领域,搭建一个国际政治领域印象管理的分析框架。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信号是指一个国家为了试图塑造或改变自我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对国际、国内观众传导的一些特定信息。如果我们把信号释放理解为一种印象管理的行为,地位信号是非常规的信号传导方式之一。^⑦

在国际关系背景下,“国际地位”是指相关政治行动者对特定国家在某些重要属性上——如财富、强制力、外交影响力——所处的位置所抱持的信念。^⑧ 根据这种定义,国际地位具有以下一些普遍特征:首先,地位与物质实力密切相关,但地位是根植

①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笔者对罗伯特·杰维斯的访谈,2013年5月24日。

③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④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7;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⑤ Thorstein Veble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967.

⑥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p.20.

⑦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9. 对国际关系领域若干非常规的信号传导模式的探索,参见 Marcus Holmes, “The Force of Face-to-Face Diplomacy: Mirror Neurons and the Problem of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4, 2014, pp. 829–861; Jessica Chen Weiss, “Authoritarian Signaling, 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1, 2013, pp. 1–35.

⑧ T. V. Paul, Debora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p.7.

于他人心目中的一种社会属性。霸权国的地位一方面来自其物质实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他国的认可。要改变一种地位就必须改变他人的观点。物质实力是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但物质实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国际地位。当一国的物质实力与国际地位不匹配的时候,常常导致国际冲突的发生。

其次,地位竞争常常被误以为是绝对的零和游戏,但地位竞争在特定背景下也可以是非零和游戏。如果地位被看成一种绝对稀缺的物质资源,这种地位竞争就是零和游戏。^① 比如,对霸权地位的争夺就常常是一种零和游戏,如果一个新兴大国获得新的霸权地位,另一个守成大国就会失去霸权地位,这种竞争是零和性质的竞争。但值得注意的是,地位竞争也可能不具有零和性质。比如,在地位被看成一种“俱乐部式的物品(*club goods*)”的背景下,地位竞争就是非零和的。^② 拥有一个特定俱乐部的地位可以带来一些特定权利与责任。^③ 俱乐部的扩大可能稀释现有成员的特权,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导致现有成员权利的完全丧失。精英集团的成员可能通过限制会员准入来维持其特有限与威望,^④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典型的精英大国俱乐部。如果这个俱乐部扩大,会稀释现有成员国的特权,但并不必然使现有成员丧失其地位,因此俱乐部式的地位竞争不具有零和性质。

最后,人们追求地位可能基于某种工具性目的,也可能基于地位所固有的象征价值。换言之,人们有时追求地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和功利的利益,^⑤有时则把地位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一些著名的社会心理实验表明,有时人们会为了获得某种象征性的地位愿意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⑥

在国际关系中,地位信号释放并非在无政府状态中表达一种良好的意愿,也不是在危机谈判中展示一种可信度。^⑦ 地位信号释放的目的在于表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获致的地位。地位信号释放研究将为以理性主义框架来检视国家的象征性

①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p. 27.

②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③ Todd Sandler,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p. 63.

④ 对社会生活中精英俱乐部的社会学研究,参见 Lauren Rivera, “Status Distinctions in Interaction: Social Selection and Exclusion at an Elite Nightclub,”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 33, No. 3, 2010, pp. 229-255.

⑤ Nan Lin, “Social Resources and Social Mobility: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Ronald L. Breiger, ed., *Social Mobi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47-271.

⑥ Bernardo A. Huberman, Christoph H. Loch and Ayse Öncüler, “Status as a Valued Resourc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No. 1, 2004, pp. 103-114.

⑦ 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的常规信号传递理论,参见 Andrew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1997, pp. 114-155; James Fearon,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8, No. 3, 1994, pp. 577-592.

行为提供新的工具。^①

霸权国的印象管理往往通过地位信号释放来实现,具有如下特征:首先,霸权印象管理的主体是霸权国政府与政治精英,其客体是各种不同的目标观众,包括国内观众与国际观众。这一点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印象管理没有根本不同。但霸权的具体目标与新兴国家有所不同。在一般意义上,新兴国家往往展现一种对更高地位的追求(status-seeking)。^② 霸权国并不追求更高的地位,其在印象管理过程中主要展现的是对现有地位的护持。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相对于争取利益,人们面临损失时往往更愿意冒险。^③ 由此推断,霸权国具有维持现状的强烈偏好,愿意为了维持其现有地位而冒险。一个衰落中的大国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防止自身地位受到削弱。^④ 就中美关系而言,一个不够自信的美国对于中国来讲可能蕴藏着更大的风险。^⑤

其次,从印象管理的策略来讲,霸权国可以通过言语宣示尤其是倾向性解释(spining)来展示其地位,也可以从行为角度通过“摆架势”、炫耀性消费以及发动战争来展示其地位。虽然这些基本策略与新兴大国的印象管理没有根本不同,但是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仍有细微的差异。新兴大国总体有追求更高地位的趋势,但呈现出“示强”或“示弱”两种截然不同的信号释放模式。^⑥ 相比之下,霸权国发出的地位信号在根本内容上具有一致性。虽然不同情况下霸权国强调所使用的手段有所不同,但其国际定位是明确而连贯的。比如,美国领导人讲话或官方声明往往强调美国要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⑦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类似观点,参见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s, and War*, 2001。

②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Yong Deng, *China's Struggle for Status: The Realign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 对前景理论的阐述,参见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Vol. 47, No. 2, 1979, pp. 263-291; Jack S. Levy, "Prospec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s and Analytical Problem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1992, pp. 283-310; Kai He and Huiyun Feng, *Prospect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Asia Pacific: Rational Leaders and Risky Behavior*,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④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⑤ 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80页。

⑥ 以中国为例,中国时而强调自己是新兴大国,时而强调自己是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参见蒲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21-34页。

⑦ 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提出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界,参见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west-point-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登录时间:2014年8月11日。此外,美国国防部最新版的《四年防务报告》强调全球领导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关键,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p. 11,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登录时间:2014年8月11日。

再次,霸权国的印象管理面临多重观众的困境。从信号传递的机制来讲,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在塑造形象的过程中,面临多重观众的不同期待和考验。比如,美国外交信号常常面临不同观众的期待,这些观众包括美国国内观众、盟友、伙伴国、潜在对手、敌对国等。

最后,霸权国的印象管理既有基本事实为依据,也有做面子功夫的操作空间。^① 国际地位是一种非物质要素,但与物质实力密切相关,因此,霸权的印象管理并不能完全脱离霸权国的物质实力基础。二战后,美国历次大战略的辩论都与美国自身实力的变化密切相关。比如,2000年前后,美国的实力优势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美国的战略家提出美国要维持其单极霸权的绝对稳定性,有的美国学者甚至提出美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帝国模式。^② 而2008年之后,美国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美国战略界又出现了新一轮主张美国战略收缩的声音。霸权有物质实力做基础,霸权国仍要做一些面子功夫,在印象塑造过程中有可以操作的空间。正如在消费行为中人们可以利用仿冒奢侈品作为地位的象征符号来制造他们想要的形象,^③ 国家也可能会夸大或掩盖其真实的实力地位。

四 地位信号与地位困境: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

本文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例,来说明霸权国在国际印象管理上的若干难题,并阐述国际政治地位信号传导的若干机制。

从2011年秋开始,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要扩展和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角色。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调整了其在亚太的军事与外交部署,以期对亚太地区的发展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动因在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引起广泛争论。有些学者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不必要的,并且具有破坏作用。比如,陆彬彬(Robert Ross)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基于对中国意图的错误解读之上的。^④ 而另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有必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⑤ 美国亚

① 在个人层面,“面子功夫”是一种印象管理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面子工程”是政府或国家做的“面子功夫”。有关“面子功夫”的社会学研究,参见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7, pp.5-45。

② Max Boot,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The Most Realistic Response to Terrorism Is for America to Embrace Its Imperial Role,” *Weekly Standard*, Vol. 7, No. 5, 2001, pp.1-5.

③ Luuk van Kempen, “Fooling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Deceptive Status Signaling among the Po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5, No. 2, 2003, pp.157-169.

④ Robert Ross, “Problem with the Pivot: Obama’s New Asia Policy Is Unnecessary and Counterprodu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1, 2012, p. 83.

⑤ Aaron Friedberg, “Bucking Beijing: An Alternative US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91, 2012, p. 59.

太再平衡战略在中国被广泛解读为一种“遏制”中国的新战略,而同时,中国学界对于如何应对这一战略存在一定的争议。^①

如果从追求安全的传统角度去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常规的安全动因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为什么要推展这个战略。如果美国仅追求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亚太再平衡战略显得不必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能适得其反。

本文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被解读为在战略不确定的环境中,美国发出一系列信号,以巩固和重塑其领导地位。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总体安全局势得到极大保障。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没有面临冷战时代那样一个旗鼓相当的战略对手;同时,美国还具有一些独特的地缘安全优势。^② 恐怖主义曾经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恐怖主义的真正威胁常常是被夸大的了。^③ 在这样的安全环境下,美国大战略辩论的核心问题常常围绕美国在全球领域应该担负何种责任和角色,并非围绕美国本土安全而展开。实际上,美国把捍卫其全球领导地位看成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而保护美国本土安全、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等具体目标是通过维护领导地位来实现的。^④ 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冲击美国霸权的综合实力,但是从发展趋势和认知的角度,中国对美国地位的冲击是存在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对实力的认知变化与实力本身的变化同等重要。中国的迅速崛起在心理与认知领域已经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印象,这种认知上的冲击比实力的冲击更为明显,加剧了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的焦虑感,塑造了美国决策者的战略选择。因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在部分层面看作一种“认知之争(battle of perceptions)”,即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就主导权的认知与观念展开某种争夺。^⑤

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奥巴马政府实际要处理的是一个在战略资源有限和战略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和巩固美国霸权地位的问题。小布什政府把美国主要的战略资源都投入到反恐和中东地区。美国的亚太盟友担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同时,中国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迅速提升了自己在区域中的影响。有些区域内国家甚至把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看成区域内不稳定的因素。由于经济危机和

① Lanxin Xiang, "China and the 'Pivot'," *Survival*, Vol. 54, No. 5, 2012, pp. 113-128.

② 因为美国独特的地缘优势,没有任何大国可以挑战美国的本土安全,参见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pp. 5-41.

③ John E. Mueller, *Overblown: How Politicians and the Terrorism Industry Inflat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Why We Believe Them*,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Press, 2006.

④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 p. 11, 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登录时间:2014年8月11日。

⑤ 陈雅莉:《美国的“再平衡”战略:现实评估和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第71页。

财政困难,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是否要实行战略收缩的讨论。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被解读为国际政治地位信号传导的一个例子。正如前文所述,地位信号的目的是维持一个国家在目标观众心目中的特定地位。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亚太再平衡战略既包括地位信号传导的一些常规机制,同时也面临多重观众带来的困境。本文在此讨论美国再平衡战略包含的一个地位信号的具体策略。

美国地位信号传导的机制和策略首先包括倾向性解释。倾向性解释是指“当一个人在叙述某件事时,着重强调某些事实并将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贯穿起来,同时对那些于己不利的事实轻描淡写或者视而不见”。^①倾向性解释是政府官员在政府新闻宣传过程中常常使用的策略。就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言,通过一系列的高调演讲和政府文件的发表,美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采用了倾向性解释策略,强调了亚洲对美国的重要性以及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必要性。^②比如,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强调了亚洲的重要性,“决定未来政治走向的关键在亚洲而不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而美国必须处于决策的中心”。^③

其次是外交与军事方面的“摆架势(posturing)”。作为强化美国在亚太军事存在的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加强了其在澳大利亚与新加坡的军事部署。美国强调,总体军事开支的削减不会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开支和部署。除了军事上摆姿态,美国在外交上也极力强调其在亚太区域的外交存在,更加积极地参与东亚多边合作。

最后是打“俱乐部式位置产品”这张牌,这尤其体现在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个动议。^④正如前文所述,国际地位可以被看成一种“俱乐部式”的位置产品。俱乐部式的位置产品未必具有零和竞争的性质,但由于其稀缺性,这种位置产品仍然有部分的竞争性质。精英俱乐部常常通过限制成员准入的方式来维持其特有的地位和权利。如果人人自动成为一个俱乐部成员,这个俱乐部的价值就有限了。近年来,美国注重从竞争的角度看待国际规则,美国主导国际规则的主要形式由全球多元模式转变为根据美国需求有条件准入的“俱乐部模式”。^⑤美国开启 TPP,目的就是

① John J. Mearsheimer, *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6-17.

②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 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 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登录时间:2014年8月11日。

③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Vol. 189, No. 1, 2011, pp. 56-63.

④ 对 TPP 的背景介绍和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参见李向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崛起过程中的重大挑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2期,第17-28页。

⑤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81-97页。

平衡中国在亚太经贸与外交领域的影响力。当然,经济本身是推动 TPP 的一个主要动因,但地缘竞争的因素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多重观众的困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观众主要包括中国、美国的亚太盟友以及美国国内观众三个部分,但这项战略调整也会影响其他区域的观众,包括美国的欧洲盟友、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对手等。^① 在外交信号传导过程中,针对一类目标观众的信号可能被另一类目标观众同时接受,不同观众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和反应。美国官员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对中国的遏制。虽然如此,中国各界对此却多有怀疑。数十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是一种接触与威慑相结合的混合战略。一方面,美国多次向中国保证其没有遏制中国的战略;另一方面,美国又力图保持对中国的威慑力,以防止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在一些美国政策精英看来,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是形塑中国的国际战略选择而不是单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美国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美国实力地位的评估与认知。在美方看来,中国越是认知到美国的强大实力,美国越能够影响中国的战略选择,包括阻止中国采取扩张性对外政策。^②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国际实力分布的图景,更改变了人们对中美实力地位对比的认知。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过高估计了中国崛起的速度,也高估了美国衰落的程度。^③ 在美方看来,中国部分官员与学者夸大对美国衰落的认知,容易引起中美双方的误判,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④ 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想要展现美方在亚太军事和外交领域具有持续的领导力和优势地位。

美国在亚太的盟友是美国战略尤为重要的目标观众。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亚洲盟友普遍忧虑美国过于关注中东地区而忽略了亚洲。这些亚洲国家担心它们在

① 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来讲,其他区域(比如欧洲)的观众也相关但其影响更为间接。美国并不希望单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它期待欧洲能在国际法和机制建设方面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做出贡献,参见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Far Eastern Promises: Why Washington Should Focus on Asia,"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4, p. 116.

② 笔者参考了李侃如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动因”研讨会上的发言,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MF),美国华盛顿特区,2014年3月14日。美国对华政策中形塑中国的战略选择的讨论,参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China: Recent Lessons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2, No. 3, 2009, pp. 89-104.

③ 在“国际研究协会”年会上,约瑟夫·奈在题为“美国大战略、思想库、亚太转向”的圆桌论坛上表达了这一观点,加拿大多伦多,2014年3月27日。

④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对美国衰落的认知是中国最近所谓“强势外交”的一个动因,学界对此仍有争议。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4, 2013, pp. 7-48; Dingding Chen, Xiaoyu Pu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orrespondence: Debating China's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3, 2013, pp. 176-183.

美国的国际战略谋划中被边缘化。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在区域内迅速崛起,开始主导一些地区事务。中国更为积极的外交角色有正面的意义,但有些亚洲国家担心中国的行为会损害区域秩序的稳定。无论如何,中国给美国的亚洲盟国造成一种焦虑感或不确定性。^①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亚洲国家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从而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对于亚太再平衡战略而言,不能忽略的是美国国内的目标观众。国内观众常常是美国领导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角色已经深深融入其主流政治文化,成为一种主流民意。^②从美国国内民众和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讲,亚太再平衡战略有重要的国内党派政治的考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很多具体政策并非新政策,而是小布什政府时期已经推行的一些政策的一种延续。小布什政府已经强调要加强亚洲盟友关系,在军事上调整了一些部署,并且开启了自贸区谈判等。奥巴马政府外交上推销亚太再平衡战略,部分原因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即奥巴马政府要在美国国内推销一个概念,其团队比前任政府更能够处理亚洲事务。^③从这个角度来讲,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出有美国国内两党政策竞争的因素。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面临财政困难和政府赤字的问题。美国决策者和一些战略家积极论辩美国是否要重新评估其国际战略,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否要实行战略收缩和战略自我限制。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动员国内支持的一种策略,以巩固美国对外战略的国内支持。

如果我们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解读为一种地位信号传导和霸权的印象管理,这对于中美关系而言具有何种政策意义?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一般被解读为一种安全困境,即一方提升安全的措施会导致对方采取对应措施,最后使双方的安全都下降。^④但是,以上的分析表明,中美竞争也许可以看成一种“地位困境”。正如在传统安全领域有信号传导的误解导致安全困境一样,地位信号的传导过程也会由于复杂的动机而导致不必要的战略竞争和冲突。与安全困境类似但不同,“地位困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方试图维持其相对位置的行为导致其他国家做出对应的反应,最后这种有代价的行为并没能改变原有的地位排序,但却耗费了不必要的资源并带来矛盾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pp. 7–48.

② Henry R. Nau, *At Home Abroad: Identity and Powe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笔者对柯庆生的访谈,2013年5月27日。柯庆生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

④ 比如,根据江忆恩的研究,安全困境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难题,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p. 5–56.

和冲突。^①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发展可能带来地位困境。这种竞争并不威胁中国和美国最基本的安全,但有可能加剧双方对在亚太的地位与角色的竞争。^②比如,针对中国发展海权和航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应该做出如下反应:“最重要的是要及时添置下一代的水面力量投射战舰以替代现有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这是针对中国领导人扩张海权的徒劳雄心的一种必要信号。”^③

以上的反应表明,美方担心中国发展航母会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而并非担心中国的航母会挑战美国的安全。^④如果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不是来源于安全困境,中美两国有必要了解双方的真实意图。由于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多重目标观众,有时美国很难发出连贯的战略信号。如果中美两国错误估计对方的意图,使竞争变成完全零和的游戏,这会损害双方在很多关键领域的合作。针对这样的情况,中美两国应该持续讨论双方在本地区的意图和角色。

五 结论

大国的兴衰是国际关系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现有文献关注新兴崛起大国如何通过各种项目谋求更高的地位。作为既有霸权国,美国并不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但仍然谋求维持其霸权国的地位。本文借鉴社会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霸权国如何管理其在目标观众中的印象做出一定的解释。

如果我们把国际政治领域的信号传导理解为一种印象管理,信号传导的方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地位信号与普通的外交信号传导有一些共同特征,也有其独特之处。地位信号传导具有工具性和象征性目的,讨论这种信号传导模式有利于理性主义

① 对地位困境的理论阐释,参见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Dilemmas and Interstate Conflicts,”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pp. 115–140; 地位困境与中美海权竞争的案例分析,参见 Xiaoyu Pu and Randall Schweller, “Status Signaling, Multiple Audiences, and China’s Blue-Water Naval Ambition,” pp. 152–162。

② Aaron L. Friedberg, “China’s Challenge at Sea,”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11.

③ 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2009, p. 78.

④ 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军事优势并不保证其在亚太区域具有绝对军事优势,中国的反介入能力会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送。参见 Evan Braden Montgomery, “Contested Primac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U.S. Power Proje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2014, pp. 115–149。即便如此,中美竞争主要涉及亚太主导地位的竞争而非两国本土安全的竞争。有些战略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航母的发展并不威胁美国的本土安全,甚至可以给中美海上安全合作带来机会。参见 Andrew S. Erickson, Abraham M. Denmark and Gabriel Collins, “Beijing’s ‘Starter Carrier’ and Future Step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5, 2012, pp. 26–27; Robert D. Kaplan, *Monso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p. 291。

与建构主义的对话。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现有霸权国在一个重要地缘政治领域的地位信号传导。正如其他信号传导行为的难题一样,美国在亚太再平衡过程中面临多重观众的不同期待,同样的信号可能被不同观众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而对于地位信号的不同解读,必然给美国对外战略带来新的挑战 and 困扰。

相对于权力转移等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式,印象管理的视角并非完全否定现有理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一种补充。国际秩序的变动和美国大战略的调整有物质实力变化的动因,也有观念与认知因素的印象。从印象管理的角度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超越物质实力与心理认知两分法的视角,从而比较全面地看待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调整。根据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历史经验,霸权国对于维护既有国际地位具有强烈的偏好,甚至不惜冒险去维持其现有地位。就中美关系而言,一个不够自信的美国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从政策意义来讲,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倾向于是一种地位困境而未必是安全困境。这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有好处但也带来极大的挑战。如果中美关系的困难在于双方不得不面临一种地位困境,这意味着中美两个大国相互之间并不构成对本土安全的威胁。但如果地位困境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具有竞争的性质。如果中美都要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排他性的领导角色,则双方关于地位的竞争会越来越难以调和。^①中美领导人和政策精英开始关注这个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②美国领导人也常常强调,美国无意遏制中国,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③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如何协调并包容彼此在区域中扮演的角色,需要两国继续探索和沟通。

(截稿:2014年7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大国间因为地位而导致矛盾与冲突,参见 Randal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s,”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8–68; William C.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28–57;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2010; Onea Tudor, “Between Dominance and Decline: Status Anxiet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0, 2014, pp. 125–152。

②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7/09/c_1111530987.htm, 登录时间:2014年8月11日。

③ 美方领导人多次表示美国无意遏制中国,其官方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0年版)明确指出美国谋求与中国构建积极、合作与建设性的关系,美方期待中国与美国共同应对诸多全球性挑战。参见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p. 43,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登录时间:2014年8月11日。